

收入不平等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

——基于鄂粤城市的实地调查

陈良敏¹,丁士军²,刘国顺²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利用 2017 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 950 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 Kakwani 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1)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 0.277,男、女性农民工分别为 0.348、0.227,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2)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关键词 进城农民工; 风险应对策略; 收入不平等; 个体相对剥夺指数; 相对贫困
中图分类号:F 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0)01-0067-08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0.01.0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8,相比近年的数据略有回升。脱贫攻坚实施以来,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村处于较低收入水平的居民比例逐渐降低。在此过程中,城市贫困问题,尤其是进城农民工贫困问题受关注相对较少。我国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8 亿,占中国总人口近两成^①。他们是城市中生计较脆弱的群体,容易受外界变化冲击导致收入不足而陷入贫困。脱贫攻坚目标实现后,将使中国迈进后扶贫时代,关注进城农民工贫困问题,将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现实困境。

农民工贫困的发生往往是由社会风险冲击导致的。生计脆弱是农民工受到社会风险冲击的主要原因^[1]。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认为,减轻威胁、灾害等各种风险的能力可视为个体的生计脆弱性^[2]。这种能力表现为在外界变化冲击下采取的应对策略,而应对策略是个体从冲击恢复的决定因素。关于生计脆弱性的研究,学者大多关注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或大型事件对农户的冲击,而对农民工群体缺乏深入的研究^[3]。目前,国内学者讨论农民工群体的生计脆弱性问题往往从风险的角度出发,从风险识别、脆弱性与风险的关系、生计风险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1,3-5]。这些研究主要

收稿日期:2019-06-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工生计转型的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71673303)。
作者简介:陈良敏(198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镇化。
通讯作者:丁士军(1963-),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户行为、农村发展。
① 数据来源于《2018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

探讨经济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生计风险的影响,但关于风险应对策略以及群体分化对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鲜有提及。在研究方法上面,国内相关研究多为定性研究,针对风险应对策略的实地调查研究比较匮乏。中国正处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了解农民工应对风险的策略将有助于政府制定针对性更强的保障措施。鉴于此,本文采用课题组 2017 年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农民工家庭生计数据,实证研究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选择,并以收入不平等水平区分农民工脆弱性,进一步研究收入不平等水平对风险应对策略决策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风险应对策略是家庭风险相关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涉及风险类型和风险处理。国内外学者针对弱势群体面临的风险和风险应对研究,讨论比较多的是农户家庭、生态移民等脆弱性较严重的群体。Dercon 根据埃塞俄比亚的农户数据总结了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事件,包括自然风险、政策变动、就业风险、土地问题、财产损失、战争或犯罪事件等^[6]。陈传波将农户面临的 12 种大额开支及经济困难归为四大类风险^[7]。还有学者将风险扩展至非收入风险的范围,涵盖职业风险、生活风险、教育与发展风险等几种类型^[8-9]。从农户分化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家庭面临的风险有所不同。进城农民工面临的生计风险与传统农户具有“自然经济风险”差异,更多源自就业市场和社会保障,最终影响农民工家庭的收入和生计状况^[1,3-4]。针对风险处理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将风险处理分为“事前”和“事后”策略。Alderman 等将风险处理区分为风险管理和风险应对策略,其中风险管理为“事前”策略,风险应对策略为“事后”策略^[10]。社会风险管理框架(SRM)将社会风险管理分为风险预防策略、风险缓解策略和风险应对策略^[11]。风险应对策略被定义为人们在遭受冲击后,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所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法^[7,11-12],有学者也将其称为消费平滑策略,包括外出打工、变卖资产、借钱和乞讨等行为^[13]。Dercon 将预防性储蓄行为也视为一种风险应对策略^[16]。目前,国外学术界对预防性储蓄行为已形成较成熟的理论模型,且关于中国居民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在面临不确定风险的条件时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动机,会把“预防性储蓄”作为未来平滑消费的手段^[14-15]。关于风险应对策略的有效性,Anderson 等分析马拉维农户的饥饿问题时提出,短期应对策略对减缓风险冲击更为有效^[16]。但是,国内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相较风险管理的研究,针对风险应对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是针对农民工群体风险应对策略的讨论较少。

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学者对经济因素与风险应对策略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首先,经济学学者认为,农户群体是遵循理性人的假设,当农户遭受外界冲击时会对风险应对策略进行理性选择^[17]。世界银行出版的《2014 年世界发展报告:风险和机会》指出,风险应对策略具有高成本和低成本两种机制,高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包括减少粮食消费或消费质量较差的粮食、出售生产性资产等,低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则是动用储蓄、借贷等方式。其次,风险应对策略选择与生计资本存在联系,生计资本匮乏对风险应对策略选择产生影响。国外学者根据多个国家的农户数据发现,贫困家庭往往先采取高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11]。Castilhos 等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低阶层家庭的风险应对策略往往是在他们社会化初期习得的^[18]。类似研究也发现风险处理策略在不同农民群体中存在差异性,经济因素至关重要^[9,19-21]。那么,农民工群体的风险应对策略是否与经济因素相关,他们的抉择是否与传统农户的抉择具有相似之处,以及农民工内部分化是否对风险应对策略有所影响? 以上问题都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去验证。

二、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设定

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7 年 8—10 月课题组对进城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此次调查内容主要涉及进城农民工家庭 2016 年的生计状况、面临的风险及风险应对情况。根据课题组的研究设计,分别

从内陆和沿海各选取一个省份作为调查地点,调查城市包括湖北的武汉和襄阳、广东的珠海和佛山。调查小组调研员均为所在调查地区的高校研究生,具有良好的本地语言沟通和理解能力。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共计获取进城农民工有效样本 950 份,其中珠海 261 份、顺德 144 份、武汉 203 份、襄阳 342 份。样本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在上游、中游和下游水平均有分布,城市人口规模差距也比较明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借鉴郇秀军等采用扎根理论对农户应对风险策略的编码方式,将问卷中提及的风险应对策略分为六种类型,即消费缓冲、收入缓冲、资产缓冲、正规信贷、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22],详见表 1。上述六种类型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不存在互斥性和排序问题,即选项为多选。每一种风险应对策略都是独立的二元离散变量。为了讨论不同收入不平等水平是否影响农民工采取不同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这里参考世界银行《2014 年世界发展报告:风险与机会》对风险应对策略的分类,将消费缓冲、收入缓冲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归类为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11],其余为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上述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为二元离散变量,采用该策略则赋值 1,否则赋值 0。

表 1 风险应对策略的分类

策略分类	具体行为
①消费缓冲	a.减少日常消费;b.不舍得看病;c.让子女退学
②收入缓冲	a.延长劳动时间;b.增加劳动强度;c.预支工资收入
③资产缓冲	a.出售、抵押资产;b.动用预防性储蓄
④正规信贷	a.向银行机构贷款
⑤正式社会支持	a.依靠政府救助;b.保险索赔
⑥非正式社会支持	a.向亲朋好友借钱;b.找高利贷

注:根据郇秀军等研究整理而得^[22]。

(2)解释变量。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为收入不平等水平,该变量代表农民工的经济实力。已有研究未直接讨论收入不平等与风险应对策略的关系,但在消费、信贷、资产处置等行为的研究中发现了探讨收入不平等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先例。在消费行为方面,学者曾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测算收入不平等水平,并发现收入不平等水平对个体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均有影响^[23-24]。收入不平等水平测算分为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群体层面的测算一般采用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分解适用于地区或收入来源等群体分类的分解,但它无法分解至个体层面^[25]。为解决该难点,个体层面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测算可采用相对剥夺指数。常用的相对剥夺指数包括 Yitzhaki 指数、Kakwani 指数和 Podder 指数^[25]。Kakwani 指数是在 Yitzhaki 指数的基础上得到的,满足无量纲性和正规化特性^[20],因此本研究选用 Kakwani 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RD(x,x_k)=\frac{1}{n}\sum_{i=k+1}^n(x_i-x_k)=\gamma_{xk}^+[(\mu_{xk}^+-x_k)]$$

(1)

(3)控制变量。为了减少变量的遗漏对结果造成的偏差,除解释变量外,再加入两类控制变量,即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相关变量。其中,个体层面变量包括性别、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种、是否新生代;家庭层面变量包括与未成年同住、与老人同住、随迁比例、安家意愿、购房安家。

3.变量描述统计

上述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2。从表中所列特征来看,消费缓冲是农民工面对风险的首要选择,占受访样本的 62.4%,资产缓冲、收入缓冲、非正式社会支持、正式社会支持和正规信贷依次降低,分别占样本的 38.2%、26.5%、22.6%、8.2%和 4.3%;面对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行为的农民工比例较高,占比 70.6%;样本农民工总样本相对剥夺指数为 0.277,表示农民工群体内收入不平等水平较小;个体特征方面,样本农民工中,男性比例较高,占 58.8%,平均年龄为 43.37 岁,平均教育年限为 7.728 年,绝大部分是普通工人或传统技术工人,自评健康状况比较好;家庭特征方面,与老人同住比例为 15.1%,与未成年同住比例为 38.8%,平均随迁比例约为 68.6%,具有长期安家意愿的为 38.1%,已在务工地购房安家比例为 19.3%。

表 2 变量定义和描述统计

类别	变量	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消费缓冲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1;不采用=0	0.624	0.485
	收入缓冲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1;不采用=0	0.265	0.442
	资产缓冲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1;不采用=0	0.382	0.486
	正规信贷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1;不采用=0	0.043	0.203
	正式社会支持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1;不采用=0	0.082	0.275
	非正式社会支持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1;不采用=0	0.226	0.419
	高成本风险应对	策略是否采用;采用=1;不采用=0	0.706	0.456
解释变量	收入不平等水平	Kakwani 指数测算得出个体相对剥夺指数	0.277	0.173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88	0.492
	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7.728	3.370
	健康状况	1~5 表示健康程度逐渐变好	4.143	0.803
	工种	普通工=1;传统工=2;现代技术=3;管理=4	1.661	1.077
	是否新生代	新生代农民工=1;老一代农民工=0	0.274	0.446
	与老人同住	与老人同住=1;不与老人同住=0	0.151	0.358
	与未成年同住	与未成年同住=1;不与未成年同住=0	0.388	0.473
	随迁比例	共同在务工地生活的家庭成员比例(%)	0.686	0.360
	购房安家	已购房=1;未购房=0	0.193	0.395
	安家意愿	有安家意愿=1;无安家意愿=0	0.381	0.486

注:“老人”指年龄在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成年指与核心家庭成员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未满 16 周岁的孩子。

4.模型设定

由变量设置可知,本文所有被解释变量均为二元离散变量,即“是否采取某种类型风险应对策略”,“是”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将风险应对策略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已有研究中,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26]。鉴于此,本文将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作为主模型,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ln \frac{P_i}{1-P_i} = \beta_0 + \beta_1 index_i + \beta_2 individual + \beta_3 family + \epsilon_i$$

(2)

式(2)中, P_i 为第*i*种风险应对策略被选的概率, $P_i/(1-P_i)$ 表示第*i*种风险应对策略被选与不被选的概率比, β_0 是常数项, β_1 、 β_2 和 β_3 分别表示个体相对剥夺指数、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第*i*种风险应对策略被选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ϵ_i 为模型的误差项。

三、收入不平等水平与风险应对策略的基本特征

1.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分组特征

通过 Kakwani 指数的计算,得出每个样本的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指数值越高收入不平等水平越高。表 3 揭示了不同农民工分组下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差异。从性别分组来看,女性比男性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略高,两者平均值分别为 0.348 和 0.227;从年龄分组来看,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①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高,两者平均值分别为 0.305 和 0.201;从教育程度来看,教育程度越低的农民工个体相对剥夺指数越高,意味着他们在群体内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其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农民工个体相对剥夺指数为 0.322,显著高于整体平均值;从工种分组来看,普通工人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最高,为 0.323,其余三类进城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比较相近,按指数值高低依次为管理人员、现代专业技

表 3 样本农民工个体相对剥夺指数

分类	类别	样本量	相对剥夺指数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	559	0.227	0.165
	女	391	0.348	0.160
年龄	老一代	690	0.305	0.181
	新生代	260	0.201	0.123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38	0.322	0.180
	初中	427	0.263	0.160
	高中	147	0.243	0.174
	大学及以上	38	0.155	0.133
工种	普通工人	633	0.323	0.174
	传统技术工人	139	0.171	0.114
	现代专业技术人员	45	0.185	0.115
	管理人员	133	0.198	0.151
	总样本	950	0.277	0.173

①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

术人员和传统技术人员。

2. 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选择

课题组收集样本农民工面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失业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等五种风险的应对策略。自然风险是指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或农业物资损毁等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农产品市场行情变差、农产品价格下跌、生产或生活成本上涨等风险。失业风险是指就业机会少、未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技能达不到工作要求等风险。社会风险是指欠债不还、财产被盗、就业单位违约、被克扣报酬等风险。经济风险是指大额的人情往来、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开支。上述风险预期带来的损失程度不同,但似乎无法直接影响农民工采取风险应对策略的优先次序。表 4 为样本农民工面对上述五种风险采取的风险应对策略选择分布情况。从自然风险采取的应对策略来看,消费缓冲是首选策略,然后依次为资产缓冲、收入缓冲、正式社会支持等。从市场风险采取的应对策略来看,消费缓冲、资产缓冲和收入缓冲仍为前三位,非正式社会支持比正式社会支持的选择频次更高。在失业风险、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应对策略选择中也有类似的规律。

表 4 样本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选择

风险应对策略	不同风险的策略选择频次				
	自然风险	市场风险	失业风险	社会风险	经济风险
消费缓冲	120	316	167	122	436
收入缓冲	32	84	72	42	121
资产缓冲	47	93	60	56	269
正规信贷	2	8	3	2	31
正式社会支持	16	2	7	21	44
非正式社会支持	14	45	15	22	173

注:根据课题组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实证结果

表 5 显示了被解释变量为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回归结果。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这里除了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同时还报告 OLS 和 Probit 模型的回归系数,以便检验回归系数方向是否具有一致性。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模型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方向一致,且模型在整体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从解释变量的结果来看,以 Kakwani 指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对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选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均在 10%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收入不平等水平越高,农民工选择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概率越高。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他们缺乏丰富的物质资源或人脉资源来抵御风险。当风险来临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减少必要的日常开支,甚至包括医疗上的支出。这印证了 Loayza 等发现贫困家庭会采取降低基本生活质量的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结论^[11]。还有研究发现,收入拮据的家庭会减少健康保健的开支,这也间接印证这个结论^[27]。

在个体特征方面,实证结果表明性别、健康状况、工种和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均显著影响个体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其中,男性、健康状况较好和老一代农民工对选择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具有负向影响,该结论符合常理。一般而言,上述三种特征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资源配置上占有优势,他们更容易在城市中获取更好的收入,掌握更多的物质资源和人脉资源。当风险发生的时候,他

表 5 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实证结果
N=950

指标	OLS	Logit	Probit
收入不平等水平	0.171 *	0.939 *	0.568 *
性别	-0.082 *	-0.419 **	-0.251 **
教育程度	-0.002	-0.012	-0.007
健康状况	-0.053 ***	-0.294 ***	-0.178 ***
工种	0.049 ***	0.265 ***	0.158 ***
是否新生代	-0.093 **	-0.441 **	-0.262 **
与老人同住	-0.019	-0.089	-0.051
与未成年同住	0.089 ***	0.454 ***	0.270 ***
随迁比例	-0.091 *	-0.452 *	-0.272 *
安家意愿	-0.036	-0.184	-0.112
常数项	0.932 ***	2.122 ***	1.291 ***
R ²	0.041	0.043	0.043
AIC	1 174.618	1 122.493	1 122.199
BIC	1 228.039	1 175.914	1 175.621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们更有可能选择借贷、动用预防性储蓄或资产来应对困难。但农民工的工种类型却对选择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具有正向影响,这可能与样本中普通工人和传统技术人员的占比过多有关,该效应有待进一步考证。在家庭特征方面,与未成年同住对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农民工随迁成员中有未成年人的情况下,农民工生活压力较大,物质资源需要分配一部分来支持未成年人在城市的学习和生活,因此他们的生计相对比较脆弱。当发生风险时,他们会因为资源剥夺较高,而选择高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但农民工家庭的成年核心成员随迁比例越高,越会减少这种应对策略的被选概率。

2.不同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实证分析

将被解释变量设置为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是为了便于分析并印证相关研究结论,为更具体地讨论,把被解释变量设置为六种风险应对策略并分别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实证结果

N=950

指标	消费缓冲	收入缓冲	资产缓冲	正规信贷	正式社会支持	非正式社会支持
收入不平等水平	1.133 **	0.674	−0.228	0.698	−0.139	1.063 **
性别	0.439 ***	−0.168	0.436 ***	0.589	0.070	−0.025
教育程度	0.009	−0.049 **	−0.022	−0.023	−0.045	0.031
健康状况	−0.195 **	0.309 ***	−0.195 **	0.418	−0.423 ***	−0.360 ***
工种	0.276 ***	0.134 *	0.151 **	0.186	0.084	0.030
是否新生代	−0.344 **	−0.308	−0.358 **	−0.418	−0.529	−0.327
与老人同住	−0.003	−0.048	−0.271	−0.012	−0.379	0.127
与未成年同住	0.388 **	0.514 ***	0.172	0.044	0.069	0.279
共居比例	−0.387 *	0.561 **	−0.252	−0.132	−0.059	−0.889 ***
购房安家	−0.018	0.333 *	0.056	−0.115	−0.029	0.439 **
安家意愿	−0.374	−0.445 *	0.118	1.027 **	−0.060	−0.243
常数项	1.067 **	−0.243	0.767 *	5.631 ***	−0.323	0.092
R ²	0.036	0.052	0.027	0.044	0.035	0.037
AIC	1 235.408	1 064.920	1 253.422	346.749	544.120	1 001.763
BIC	1 293.686	1 123.198	1 311.700	405.027	602.398	1 060.040

(1)收入不平等对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从六组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以个体相对剥夺指数代表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对消费缓冲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具有显著正影响。这与上文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结论基本一致。这说明,相对贫困的农民工,遭遇风险的时候倾向于节衣缩食、减少医疗和教育开支,并且只能向亲朋好友或高利贷借款来缓解风险冲击带来的经济压力。

(2)控制变量对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从性别来看,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选择消费缓冲和资产缓冲这两种风险应对策略,其中消费缓冲的被选概率较高。从教育程度来看,教育程度越低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这种容易损害健康的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相对于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获取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不同,工资待遇水平较高,他们掌握的物质资源和人脉资源较多,选择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较小。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不仅会通过消费缓冲、收入缓冲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等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来缓解冲击,还会向政府社会保障机构寻求救助或申请保险赔付,这说明进城农民工对基本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制度有所了解。从工种来看,农民工从事岗位技术型或管理型的岗位,面对风险时会倾向选择消费缓冲、收入缓冲和资产缓冲三种应对策略。从年龄来看,老一代农民工选择消费缓冲和资产缓冲的概率更高。从随迁情况来看,与未成年同住的农民工更会选择消费缓冲和收入缓冲,如果成年人随迁比例越低则会加剧其选择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从购房安家来看,已在城市购房安家的农民工除了选择向亲朋好友借款外,还会选择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来缓解压力。从安家意愿来看,有明确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例如向正规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反之则会倾向于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来解决困境。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采取变量替换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这里将解释变量由个体相对剥夺指数变为家庭人均收入,并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表 7 是采取新变量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模型(1)~(7)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为消费缓冲、收入缓冲、资产缓冲、正规信贷、正式社会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和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回归结果。每个模型均与上述模型一样控制了农民工样本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民工越不会采取高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尤其是降低基本生活水平的消费缓冲方式。该结论与采用个体相对剥夺指数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上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N=950

指标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收入	-0.743* *	-0.146	-0.119	-0.681	-0.284	-0.299	-0.589*
个体特征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1 235.677	1 066.542	1 253.519	346.183	1 005.328	543.918	1 124.380
AIC	1 293.954	1 124.820	1 311.797	404.460	1 063.606	602.196	1 182.658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课题组 2017 年对湖北和广东两省 4 个城市 950 户进城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二元 Logit 模型,并辅以 OLS 模型和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对消费缓冲、收入缓冲、资产缓冲、正式信贷、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等六种类型风险应对策略和高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采用消费缓冲、资产缓冲和收入缓冲等高成本应对策略。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群体主要是女性、教育程度较低、老一代和职业技能水平低的农民工,他们也是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较为丰富与可及的情况下,会改变风险应对策略,转而寻求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例如女性农民工在资产状况较好的情况下会采取出售抵押资产或动用预防性储蓄的方式缓解风险冲击,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还倾向于求助政府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等。未成年人子女随迁会抵消成年人随迁所带来的风险抵御能力,也就是会加大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被选的概率,并且市民化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越倾向于采取正式信贷的风险应对策略,例如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和保险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再次强调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这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保障措施之一。本文对进城农民工的风险应对策略进行研究,也发现进城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改进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方面,风险应对策略的抉择反映进城农民工的风险应对策略与小农具有相似的逻辑,与城镇居民存在差异,值得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加以重视。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进城农民工更倾向于采取高成本的风险应对策略,意味着改变进城农民工生计脆弱性,才能减少风险应对的成本。鉴于此,对继续强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加强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普及问题。由于进城农民工生计脆弱性较强,本身抵御风险的举措较少,只有通过更加完善健全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才能解决其资源匮乏的问题。第二,对相对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咨询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进城农民工中特殊群体的人力资本。一方面,针对年龄较小的进城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的机会,从本质上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另一方面,向年龄较大和身体素质较差的进城农民工提供职业发展咨询和技能改造项目,增强进城农民工失业后的应对能力。第三,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开发多种针对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从信贷和保险两方面提高进城农民工物质资源的可及性。一方面,提供针对进城农民工更优惠的金融信贷产品,帮助进城农民工解决在城市进行创业或安家落户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提供能够弥补基本社会保障不足的金融保险产品,减少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中出现的经济风险冲击。

参 考 文 献

[1] 苏飞,潘云新,李智美. 杭州市农民工生计风险识别与抗风险能力评估[J]. 浙江农业科学,2015,56(1):149-151,155.

[2]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M]. London: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

[3] 潘云新,苏飞,赵秀芳,等. 城市农民工生计风险分析及其政策建议[J]. 北方经贸,2012(12):51-53.

[4] 顾永红,杨五洲. 农民工社会风险识别与抗风险能力评估[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1):40-45.

[5] 车蕾,杜海峰.就近务工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4):48-56.

[6] DERCON S. Income risk, coping strategies and safety nets[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02,17(2):141-166.

[7] 陈传波.农户风险与脆弱性:一个分析框架及贫困地区的经验[J].农业经济问题,2005(8):47-50.

[8] 赵雪雁,赵海莉,刘春芳.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民勤绿洲区为例[J]. 地理研究,2015,34(5):922-932.

[9] 万文玉,赵雪雁,王伟军,等.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生计风险识别及应对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J]. 经济地理,2017,37(5):149-157,190.

[10] ALDERMAN H,PAXSON C H. Do the poor insure? A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on risk and consump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BACHA E L. Economics in a changing world:volume 4:development,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4:48-78.

[11] LOAYZA N,OTKERROBE I.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4:risk and opportunity-managing risk for development:overview [R]. Washington,D C:World Bank,2014.

[12] LALOU R,VICTOR P,ACCENTA L. Migrants and aids:risk management versus social control:an example from the Senegal river valley[J]. Population(English edition,2002-),2004,59(2):195-228.

[13] 陈传波,丁士军. 对农户风险及其处理策略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3(11):66-71.

[14]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 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 经济研究,2001(11):35-44,94.

[15] 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 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3(5):3-12,91.

[16] ANDERSON C,LEIGH R T,MERFELD J D. Relating seasonal hunger and preven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a panel analysis of Malawian farm households[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8(54):1737-1755.

[17] ELLIS F. Peasant economics:farm households and agrarian development [M]. Second Ed. New York: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8] CASTILHOS R B,FONSECA M J,BAVARESCO V. Consumption,crisis,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lower class families in Brazil: a sociological accou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2017,4(41):379-388.

[19] 史俊宏. 生态移民生计转型风险管理:一个整合的概念框架与牧区实证检验[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29(11):37-42.

[20] 赵立娟,史俊宏. 农户风险管理研究进展及启示[J]. 经济论坛,2012(9):115-118.

[21] GLOEDE O,MENKHOFF L,WAIBEL H. Shocks,individual risk attitude,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Thailand and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2013(71):54-78.

[22] 邵秀军,李树茁,李聪,等. 中国农户谨慎性消费策略的形成机制[J]. 管理世界,2009(7):85-92.

[23] 周广肃,樊纲,马光荣. 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家庭可见性支出的影响[J]. 财贸经济,2018,39(11):21-35.

[24] 甘犁,赵乃宝,孙永智. 收入不平等、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家庭储蓄率[J]. 经济研究,2018,53(12):34-50.

[25] 任国强,黄云,周云波. 个体收入剥夺如何影响城镇居民的健康? ——基于 CFPS 城镇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科学,2017(4):77-93.

[26] 苏芳,尚海洋. 农户生计资本对其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12(8):79-87,96.

[27] SARTI S,TERRANEO M,BORDOGNA M. Poverty and private health expenditures in Italian households during the recent crisis[J]. Health policy,2017,121(3):307-314.

(责任编辑:毛成兴)